



高等院校通识课程规划教材

中西文化概论



田彬华 赵荣 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高等院校通识课程规划教材

中西文化概论

田彬华 赵 荣 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化概论 / 田彬华, 赵荣主编.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

高等院校通识课程规划教材

ISBN 978-7-5663-1192-4

I . ①中… II . ①田… ②赵… III . ①比较文化 - 中国、
西方国家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181 号

© 2014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西文化概论

田彬华 赵 荣 主编

责任编辑：阮珍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170mm × 230mm 16.5 印张 304 千字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1192-4

印数：0 001-2 000 册 定价：32.00 元

前 言

本人担任“中西文化概论”课程多年，但每次选订教材都是一件相当苦恼的事，可选教材范围虽广，却总不能找到一本让自己满意也让学生感兴趣的教材书本。在机缘巧合下，我与我们学院的田彬华老师一起承担了《中西文化概论》的主编工作，我们联系同事多次讨论，制订出教材编写总纲，再根据编写宗旨和提纲四处招兵买马，组成了一个编写小组，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完成了这本教材。下面先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编写的基本情况。

首先要谈谈我想编写《中西文化概论》的初衷。如果用心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中外文化比较（概论）、中西文化比较（概论）、跨文化交际等类似的文化比较、文化概论的书籍或教材，你会发现，搜索结果之多着实让人意外，但是，如果你再仔细阅读这类教材书籍，你会发现，编写、撰写水平参差不齐，值得点赞的教材或参考书并不多见，或多或少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内容理论性太强，教条式的知识灌输失去了文化书籍或文化教材应有的趣味性，老师在使用这类书做参考时，很难做到深浅度的拿捏，进而无法很好地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而对于学生来说，读此类书的结果不是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就是味同嚼蜡失去了对文化学习的兴趣；

二是内容太过浅显，变成了知识小百科式的文化简介。作为大学文化类教材，不能仅对文化现象或文化事物做浅尝则止的介绍，而应该提高学习目标的难度和高度，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文化功能与意义、文化比较、文化交际等层面进行分析和讨论，教会学生用文化之眼看世界、看社会，同时又能对各种文化现象做分析和解读。

三是内容过时，有些教材总体质量不错，但在内容上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理论知识更新滞后，所举例子不符合时代语境或与现实社会脱节，这在一定程度形成了老师教学和学生思考理解的阻力，同时也消减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2 中西文化概论

四是内容不够系统性。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生活就是文化的实践，因此，要把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说清楚，难度很大，尤其是个人知识结构和知识量的有限，对文化做全景式的完整描绘与讨论，实在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因此，这类书中就出现了内容上的不完整、结构上的失衡、形式上的以偏概全或阐释不够专业、准确、深入等问题。

此外，课后作业设计不科学、配套学习资源不足或缺乏等也是常见的一些问题。

因此，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在讨论后设计出编写总纲——以突破原有教材的模式和内容，编写适合目前大学生学习、阅读的文化通识教材为宗旨，以突出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为编写原则，因此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创新性和特色，避免冗长、抽象的理论讲述而力图以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方式将文化理论和文化现象的分析介绍给学生。这本教材在内容上也注意以激发学生对文化的兴趣，提高学生文化素养为目标，同时注重强化人文学科课程的实用性。

在具体章节和内容上，为了呈现更为全面和完整的中西文化概况，前面一至八章从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到现实层面的生活风俗，从国家观念到家庭结构再到伦理观，从文学音乐的艺术层面再到日常生活的衣食行——尽量做到文化的全景式展现和讨论，而最后一章则作为全书的总结，在回顾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同时展望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交流的未来图景和构想策略。那么从内容设计上考虑编写难度以及编写质量、学习效果等问题，我们组成了编写小组，根据每章的主题寻找相关专业的且具有较高水平的老师参与撰写，并要求老师根据每章的主题和内容在编辑撰写中做到理论陈述少，例子说明多、案例分析多，语言平实、生动、有趣。

此外，我们还特别注意课后作业以及延伸阅读的环节安排。为了检验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并实现学习实践能力和动手动脑能力的训练，我们对课后作业设计做了改革，突破原有问答题或论述题的枯燥模式，而通过多样化、参与性强、实践性强的讨论、动手设计制作、体验、赏析、比赛、调查、模拟、观摩等方式给予学生学以致用的机会，引导他们思考、创作，而不只是填鸭式的、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另外，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阅读量，每一章也要求列出相关参考文献，这些文献既是编者编写时参考或谈及的著作、论文，同时也作为大家的阅读书目。

由于时间紧迫，从接到编写任务到交稿仅有半年多时间，而我们参与编写的

各位老师也都有教学、科研等工作压力和家庭生活的琐碎缠身，所以大家能从繁重的任务中抽出时间来完成编写，的确需要花费一番精力和心思，在这里，我要感谢参与撰写的各位编者，这本书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各位读者，当你们拿到这本教材翻开前言就意味着正式开启了中西文化的学习之旅，我希望，沿途的图景、解说与分析能让你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每章的分析与讨论中你们能有所思、有所得；而当在这趟学习之旅结束时能给我们点个赞，我们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就值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编写经验、编者个人认知、知识量、笔力等因素，在这本教材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和读者不满意之处，我们诚恳地希望大家能给予指正和建议，谢谢！

赵　　荣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 2014 年 9 月 2 日

目 录

第一章 觉悟与启示：中西方宗教思想比较	1
第一节 作为文化策略的儒家	3
第二节 作为文化策略的道家	7
第三节 作为文化策略的道教	8
第四节 作为文化策略的佛教	10
第五节 作为文化策略的基督教	12
第二章 “国”与“家”：中西方国家观念、家庭结构与伦理观	17
第一节 中西方国家观念概述	17
第二节 中西家庭及其伦理道德观的对比	39
第三章 眼观——中西文学中的文化比较	59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与《楚辞》	59
第二节 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荷马史诗	68
第三节 从文学看文化	84
第四章 耳听——音乐中的中西文化比较	87
第一节 中西音乐文化的特征	87
第二节 中西音乐的历史时期	91
第三节 中西音乐的主要种类及体裁	99
结语	109



第五章 舌尖上的美味——中西饮食文化比较	113
第一节 食物与文化：文化多棱镜	113
第二节 就餐方式与礼仪食俗	123
小结	129
第六章 行走中的文化体验——中西旅游文化比较	133
第七章 身体的文化感受——中西服饰文化比较	155
第一节 中西服饰文化发展与演变比较	155
第二节 中西服饰审美文化比较	190
第八章 生活的表述——中西民俗比较	199
第一节 概论	199
第二节 中西节日——民间生活中的文化表述	209
第三节 由表及里——节日下的中西文化深层剖析	221
第九章 时代语境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227
第一节 时代语境的变迁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	231
第二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243

第一章

觉悟与启示：中西方宗教思想比较

- ◆ 儒家
- ◆ 道家
- ◆ 佛教
- ◆ 基督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认识能力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人类对日升月落、电闪雷鸣、春华秋实之类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认为这些现象受到了超自然力的支配，从而形成万物有灵论，进而出现了各种自然神；同时，由于对自己的生理现象无法理解，认为生老病死也是受超自然的力量控制着，特别是梦境就更加古怪了：在梦里，可以自由地在过去和未来中出入，可以到从来没到过的地方，明明死了的人，又来到梦里和自己亲密地交谈……于是原始人类便认为人有灵魂，而且这灵魂是不死的。这样，以自然崇拜和灵魂观念为基础的原始宗教就产生了。

原始宗教是一种自发的宗教，它的主要功能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心理，以及获取超越自身力量的愿望。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们深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乞求超自然力量（神）的庇护，迷信和巫术便是实现这种目标的具体手段，因此，宗教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和手段出现的。只要有宗教存在，无论其内涵如何改变，这一基本功能都不会消失。

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社会组织形式的进化，思想意识的成熟，宗教也从原始的自发宗教发展为人为宗教。人为宗教不再是单纯表现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恐惧，或者妄图获取超越自己生理限制的力量，它们关心人类中带有普遍性

的一些问题，例如：人世苦难的根由和解决办法，善与恶的来源、性质和结果，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关系等，这是原始宗教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它们能够不受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影响，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能在它们中找到精神的依托，得到行动的动力，这也是它们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原因。

同时，人为宗教在古代社会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演化成为一种社会统治策略。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口急剧增长，阶级与国家出现，人类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宗教的目的也开始转变为协调社会成员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宗教担负起了伦理道德甚至是法律的功能。宗教成为文化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儒释道和西方的基督教都是前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都是为顺应自然而形成的生存策略的组成部分。作为文化策略，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的基督教第一个大的共同点是：将信仰作为团结人群最有效的武器。在那个时代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巨大差异，社会制度的极度不合理，对于社会的所有成员而言，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共同性只可能是暂时的，所以需要更为内在的共同的精神信仰。宗教正好可以担负起这个任务。宗教通过加强对超自然力量的从属感，从而强化人们对社会共同体的认同与服从。在古代社会，宗教往往具有更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儒释道和基督教作为文化策略，第二大共同点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对宗教道德伦理作用和社会心理调节功能的空前重视。无论是儒释道还是基督教，都热衷于描绘苦难的根源、善恶的性质，并且不约而同地将其与不合理的现实社会体制割断联系；宣扬“人生即苦”、“原罪”、“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让人们安于命定，与此同时，还设计出一套宗教伦理和礼仪，并将其化为道德实践。儒家追求“践仁”（孔子），“致良知”（王阳明）；道教强调“欲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葛洪）；佛教宣扬“众生平等”、“慈悲为怀”、“六和敬”（即佛教徒互相敬重、和谐相处的六种规则）；基督教则以“爱”为中心，要求人们爱上帝、爱他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

第三大共同点是：为了应付前工业文明的物质匮乏，提倡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在宗教中，禁欲主义往往以教徒必须遵守的戒律的面目出现。中国的儒家，虽然无明确戒律，但将“克己制欲”作为达到至高境界的必要途径。孔子认为圣人就是达到了仁的境界的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到了宋明儒家那里，更是大谈“存天理，灭人欲”；道家认为要成为齐物逍遥的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必须忘掉自我、忘掉功名、“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

大宗师》)、清静无为、“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至于道教和佛教，则各自制定有所谓“三戒”、“五戒”、“八戒”、“十戒”之条例，要求信徒遵守；基督教虽然没有复杂的戒律，但它认为人的肉体欲望是不纯洁的，沉溺于肉体欲望，就是接受了魔鬼的诱惑，背离了上帝的道路。人的现世生活是暂时的、意义不大，来世生活才是永恒的、幸福的。人要得救必须以精神克服肉欲，以神性克服人性。

宗教作为文化策略的功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最终都被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也许在宗教最初出现的时候，会被统治者看成一种社会异己力量，进行排斥和镇压，随着这种宗教的传播，最终往往会被统治者接受和利用，将其放大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甚至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中国，以及基督教在西方，都有类似的经历。

第一节 作为文化策略的儒家

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生活方式。农耕民族长期定居，不像游牧民族那样经常迁移流动。长期的稳定共同生活，维持一定区域内的家族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使中国古代社会十分讲究血缘氏族、宗法等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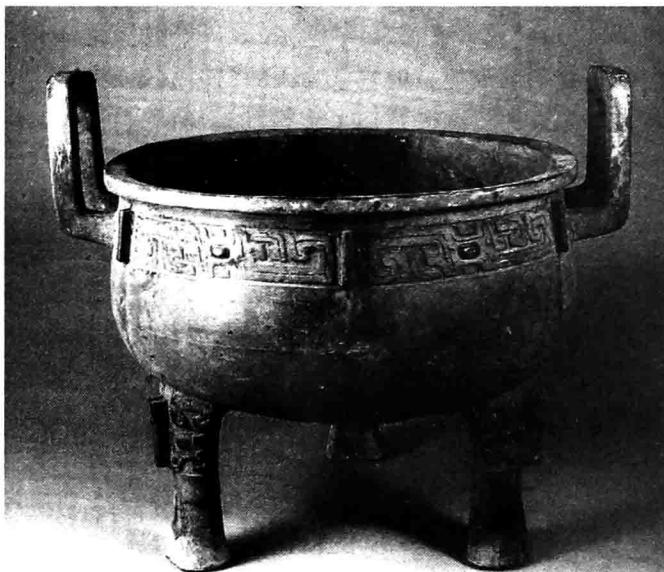
中国上古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每个人都是这种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一分子，都有维持群体关系的义务。在家庭中，首先要确立父亲的绝对地位，以父为中心，长幼有序，确定上下尊卑，任何一级不得逾越。家庭之扩展便成了国家。家国同构、忠孝一体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特点。

西周的宗教制度，代表了中国上古宗教的最高成就。西周的宗教制度是一种国家宗教，它主要包括天命宗法制度、宗庙制度、祭祀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天”(或天帝)是最高的神，有意志，有人格，操赏罚，天命不可违；周王因道德高尚，“以德配天”，受命于天，自称“天子”，主宰人世的一切，他以血缘关系的亲疏分封诸侯，成为大宗，诸侯又按血缘关系进行分封，这就是天命宗法制。

宗庙是祭拜祖宗，祈求祖宗保佑的地方。按照宗庙制度，只有周王和每个受封者才有权设立自己的宗庙，奴隶和庶人既无经济能力，也没权利修建自己的宗庙。

祭祀大致有三类，一为祭天地，二为祭社稷(土地神和谷神)，三为祭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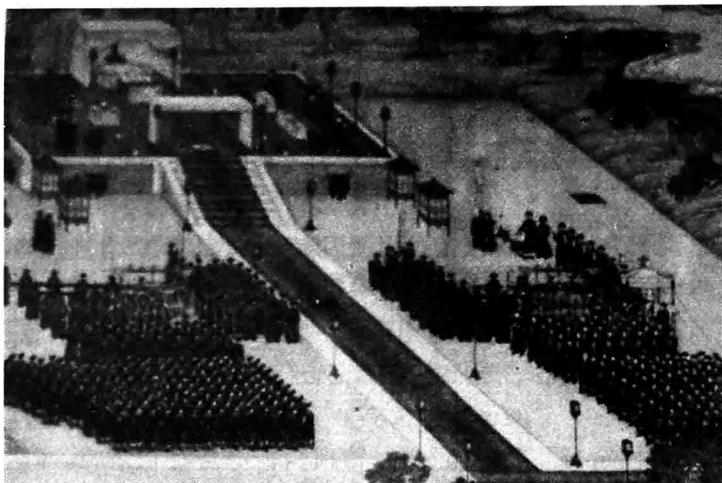


西周奴隶主，制定出整套礼制，规定了森严的等级差别，以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由于礼制的加强，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藏礼于器”。这类器物叫作“青铜礼器”，简称“礼器”，或称“彝器”。例如鼎原来是炊器，后来成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按照礼制组合成的所谓“列鼎”，何休注《公羊·桓公二年传》：“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鼎是奴隶主统治权威的象征。

其中，祭天地是周天子的专利，诸侯不能祭祀天地只能祭社稷，祭祖先不论贵贱贫富均可的。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祭天，所以诸侯或百姓有胆敢祭天者，将会看成是造反的宣言。祭祀规格依等级不同而有区别，周王和诸侯除了使用大量神器外，还用牛羊猪以及活人为祭品。

因此，在西周，宗教成了国家意志的体现，宗教的伦理道德也被国家化为统治策略。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铁器与牛耕的普及，个体家庭可以脱离宗法血缘家族而独立从事生产。人们垦荒扩大农田，经商或从事手工业。人口流动性增加，旧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地籍关系进一步代替了血缘关系。诸侯、卿大夫通过兼并、开垦，掌握大量土地，“士”和一般自由民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



《清雍正皇帝祭先农坛图》，此图描绘了清雍正皇帝率王公大臣，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前往先农坛祭祀的场面。时间为每年农历二月当中的一天。在北京南城永定门内，是明清两期皇帝祭祀神农，祈求五谷丰登，社稷安宁的地方。

土地。“私田”增加，而“王室”“公室”的土地日益减少。

土地所有权的下移，导致周天子的最高土地所有权的不复存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经济基础日趋瓦解。经济实力的增强，使诸侯和卿大夫政治实力大增，相继建立了地方政权，周天子形同虚设。周王室在政治上的衰落，诸侯割据，战争频繁，哀鸿遍野，国家宗教也产生了动摇，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

国家宗教的衰落导致宗教礼仪标准的破坏，僭越事件屡屡发生。到春秋末年，鲁国大夫竟毫无顾忌地到泰山祭天，且在祭祖时使用天子祭祖之礼。以至孔子闻知后，愤慨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同时，战乱的频繁，人们朝不保夕，导致对“天”的怀疑。天本为全知全能、公正无私的神，为什么现在却对人世祸患不管不问、是非不分，甚至连周天子都不加保佑呢？人们从敬天畏天，到疑天怨天，进而恨天骂天了。如：“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诗经·大雅·荡》），意为天虽威力无边，但其决定常常不正确；“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诗经·小雅·雨无正》），意为堂堂的上天，实属无德。一些思想家则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提出轻神重民的思想：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鲁国闵子马说：“祸福无门，



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儒家的宗教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试图在“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现实图景中，为人们提供新的精神支柱，修正人们的行为，挽救世道人心。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朝固有的国家宗教观念进行修正，采用的是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儒家承认有主宰自然、社会和人的命运的天的存在，但又认为人能通过“践仁”等途径探知天命。对鬼神和人死之后的彼岸世界，儒家采取回避态度，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但是对宗教礼仪，儒家特别重视，特别是丧葬与祭祀之礼。既“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又要祭祖祀神，似乎矛盾，但孔子解释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意为祭祀神明和祖先时，就像他们真的在面前一样。也就是说，祭祀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从另一个方面说，表达对鬼神的敬畏也是肯定宗法伦理、为现实生活确立秩序的需要——能够起到礼的作用。

比较起周的国家宗教，儒家重现世，重人生，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社会人生中，达到“仁”和“礼”的道德实践目标。儒家强调的不是宗教的信仰本质，而是社会教化功能。儒家之提倡“仁”和“礼”，就是因为当时社会不仁和无礼。在政治上，希望统治者能够施行仁义，爱护人民；在生活中君臣父子都能各安其分，各守其责，也就天下太平，其乐融融了。

儒家天的观念，对鬼神的态度，敬天祭祖的传统，对彼岸世界的淡化，以及注意宗教的治国安邦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来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自西汉以来，儒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思想的正统，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封为“孔圣”、“至圣文宣王”，其语录著作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成为封建时代的“圣经”。为了显示对儒学的推崇，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将祭孔看成与祭天地社稷一样重要的国家大典，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在曲阜孔庙或太学、郡县学中祭祀孔子，并有一套庄严隆重的仪式。这说明儒家完成了宗教化的过程，成为了国家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节 作为文化策略的道家

道家也是在先秦礼崩乐坏的现实中产生的，但它完全贬低西周国家宗教的天或上帝，设计出了一个万物的最终创造者——“道”，天地鬼神都是第二位的。“道法自然”，实质上以自然的“道”取代了宗教的“天”。

道是不可知的，人在其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所以遭遇天灾人祸、强盗暴君，不可埋怨谁：“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世间》）。意为知道无法改变而安于命运，是很高的德行。人要获得自由，只能是精神上的。在精神上加入自然的循环中，达到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境界。具体途径是超脱于是非、名利、生死之累，达到忘形去知，无情无欲，成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的至人、圣人、神人、真人。

与儒家的修正主义不同，道家对西周的国家宗教观念采用的是解构主义策略。他们对天地鬼神、国家社稷、名利生死统统持否定态度，告诉人们不可执著于现实的功利，而应该关注生命中更本质的需求，追求更大的自由。逍遁世，无欲无己，无生无死，可能没有比这更彻底的解决社会混乱、人世纷争的办法了。从逻辑上说，道家之所以采取这样彻底的禁欲主义和出世主义态度，与对社会的极端失望有关，是礼崩乐坏的现实在老庄心灵中引起反响的结果。

道家虽不是宗教，但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当道家与法家结合，演变成黄老治术；当道家与神仙术、阴阳术结合，演变成黄老方术。黄老治术曾经被统治者看重，汉初将黄老之学用于治国，休养生息，无为而治，道家如昙花一现般成为统治者官方意识形态，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儒家在被尊为正统后，黄老治术正统地位消失，黄老的方术反而发展起来。

文化作为一种策略，应该全面满足该文化体系内在的要求。儒家礼教固然有助思想教化和社会秩序，但却虚化未知世界，束缚自然天性，无法满足人们对生命的欲求。人都有执著生命、害怕死亡的本能，所以即使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也沉浸于长生不老之术。黄老方术一经宗教化，老子庄子再一经神仙化，道教就产生了。

与此同时，作为生活哲学的道家思想也在发展。魏晋的玄学家有感于儒家礼教刻板，束缚人性，转而转向道家，吸收其出世养生的思想，调和名教与自然，实行儒道互补，而后，老庄之学成为乱世逸民的全身之术，为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最终与儒释合一，成为中国文化策略的核心部分。

第三节 作为文化策略的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更容易被中国人所理解，也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

道教作为一个大型的宗教，与世界其他大型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有一大区别，就是没有明显的教主创教时期，没有统一的教团组织，其理论准备时期非常之长。

道教的主体内容大致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商周以来就流行的鬼神崇拜、巫觋占卜与祭祀，包括国家宗教和民间信仰；二是源于上古、盛行于战国秦汉的神仙方术；三是两汉之际推崇的以阴阳五行推验灾异祯祥的谶纬之学；四是两汉黄老学派通过对黄帝、老子的神化，对道家的改造而形成的修道、养生、仙化信仰。

大抵好生恶死是人的本能，犹以权贵者更迷恋长生不死。道教的根本目的，是迎合人们热爱生命的本性，告诉人们长生不老的途径。

中国很早已有昆仑神山和蓬莱仙境两大神话系统，引起无数人的遐思向往。在历史上，有无数方士投身于寻神山、求仙药、炼仙丹的活动；无数帝王站出来推波助澜，赫赫有名的秦皇、汉武皆醉心神仙方术；民间更是热闹非凡，自古有所谓“行西王母寿”之类的活动；文人也不闲着，东汉后期出现的《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皆是文人梦笔，奠定了早期道教的基本理论框架。

但这些只是为道教的出现作好了理论和社会心理的准备，还不能说道教作为宗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一种宗教要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体系和众多的下层信徒。道教组织的出现与东汉顺帝时张道陵所创的“五斗米道”和汉灵帝时黄巾军领袖张角创立的“太平道”有关，它们都有教义、教仪、组织和戒律，初具宗教规模。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的下层信徒，与当时政治黑暗，天灾人祸流行，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人心祈求温饱、向往太平有直接的关系。在宗教史上，一种宗教的出现，往往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相关。其实，在《太平经》中已经有要求统治者顺应天地之道、体察民情、整饬吏治的政治主张。

虽然太平道所领导的黄巾军也被镇压下去，五斗米道在张鲁投降曹操后受到了挫折，但道教组织特别是五斗米道并没停止活动。后世以张道陵为教主的天师道，就是从五斗米教发展过来的，两晋时期许多次农民起义，都以道教作为组织号召群众的工具，道教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而



西王母讲经车骑画像石。表现出气势磅礴的车马出行、主人公的雍容、上帝诸神的可怕形象，画面讲述人飞升到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昆仑山极乐仙境。西王母和东王公所代表的昆仑山仙界的出现，是古人浪漫主义思想闪电幻化出的一束最绚丽夺目的光彩。

且，我们可以看出，与世界上许多大的宗教一样，道教最初也是作为一种社会异己力量出现的。

正是如此，统治者对其又爱又怕。从曹魏开始，对早期道教实行利用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直到东晋才有所改变。东晋南北朝时，由于统治集团之间严酷的权力争夺，豪门贵族互相残杀，朝不保夕，许多门阀士族包括帝王都成了五斗米道的信徒，道教从传播于民间的组织上升为官方承认的正式宗教。道教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东晋的葛洪（283—363）。葛洪不但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而且还将儒家的纲常名教引入道教，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抱朴子·对俗》）他主张道教养生，儒术应世，一为内，一为外，可以互为补充。

葛洪调和儒道的基本思想，使道教更易于被统治阶级接受，为道教的官方化